



新诗研究丛书



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

——新诗话语研究

Xiandai Hanyu de Shixing Kongjian

Xinshi Huayu Yanjiu

张桃洲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张桃洲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4
(新诗研究丛书)
ISBN 7-301-08357-2

I. 现… II. 张… III. ①汉语-研究-现代②新诗-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H109.4②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7003 号

书 名: 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

著作责任者: 张桃洲 著

责任编辑: 张雅秋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357-2/I·070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原创阳光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异 16 开本 18.5 印张 262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新诗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洪子诚

编委：孙玉石 吴晓东 洪子诚 姜涛 谢冕 臧棣

本丛书得到北京大学中坤学术基金资助

本著作得到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11”工程项目出版资助

新诗研究丛书·出版说明

推动中国新诗研究的深入开展,出版相关的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成果,是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工作重点之一。为此,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拟定了组织出版“新诗研究丛书”的计划。丛书的选题主要是:

- 一、新诗理论研究;
- 二、新诗史,包括断代史、流派史、诗刊史等;
- 三、诗歌文本阅读和重要诗人研究;
- 四、新诗文化问题研究;
- 五、有价值的新诗研究资料;
- 六、其他。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新诗研究丛书编委会

2005年4月

序

朱 寿 桐

“话语”这个词已经新鲜得很久，终于成为研究者和读者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批评术语。然而将“话语”置于现代汉语诗歌的理论研究，并力图从中掘示出诗歌内在的艺术规律，不能不说是张桃洲博士的一番学术开拓。他的这番学术开拓的自然进程我有幸了解大半，而他的这番学术开拓的理论成果我也颇有感悟。

自新诗诞生以来，围绕着新诗或曰白话诗、现代诗、现代汉语诗歌的论争、探究、讨论、评析或可以说汗牛充栋，不过大量的研究其实都常常外在于新诗自身。新诗历史的研究固然是对新诗发展进路的一种描述，新诗流派和社团的研究也常常从诗人们美学的、文化的乃至社会学的链接解析诗歌现象，即便是关于新诗诗性内容与表达形式的探讨，也往往还是对诗歌表现的思想情感和音律结构的解剖，与新诗自身的实存、质量和特性其实并没有多少关联。也就是说，大量的研究其实都还不能明白地通向对诸如此类问题的解答：什么是诗（当然包括什么是新诗）？为什么表达这些内容就是诗？为什么这样表述就叫诗？如果将这些问题回答了，诗歌理论也就走向了无可争议的完备和圆满。当然，古今中外的诗学理论、美学理论乃至哲学理论综合起来都难以解答这些简单的问题，越是简单的问题论证起来往往就越需要调动人类长期以来共同的智慧积累，于是我们领悟了诸如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数学命题的难度及意义。我不是说我们的新诗研究必须完成解答这些问题的任务，但如果我们的研究更多地趋近于这些根本的诗学问题，那么新诗研究的学术景象一定会更加精彩迷人。

张桃洲从“话语”切入新诗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切入新诗理论和创

作的考察,切入新诗传统与前路的探索,其学术努力的绩效如何自有方家和读者评说,但其所显露出来的还归新诗自身,从新诗的实存、质量与特性出发提出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的学术意向,无疑属于一种颇见张力的学术开拓。这样的学术开拓如果成功,其意义很可能会溢出新诗研究领域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论从专业队伍还是从基本成果,往往壁垒森严地划分为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和戏剧研究几大板块,各板块之间似乎越是界限分明,学问越是纯真。这种按照不同的体裁分门别类营造学术阵容的构想并不是没有道理,问题是从学术成果的实际情况来看,人们很容易发现,这样的分门别类常常不过是研究者各自画地为牢的策略而已:无论研究什么文类,内容差不多都是反帝反封建,同情劳动人民,表达反抗要求等等,至多在艺术特色上分别勾勒出体裁的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性相当有限,小说中的典型化和人物形象的鲜明生动性在戏剧中固然照样可用,在散文的描写和诗歌的刻画中也不妨借来一用。或许一种理想的学术境界应该是,研究哪一种文类最好都努力通向确认这一文类的实存、质量与特性,也即通向回答什么是小说、散文、戏剧、诗歌,以及为什么分别表达了这样的内容就成了小说、散文、戏剧、诗歌,还有何以这样表述就可以分别叫做小说、散文、戏剧、诗歌。这才是真正的本体研究,也是文学研究分门别类的最重要的价值依据。

回到张桃洲的新诗话语研究,他的学术开拓确实越过了一般的新诗历史研究,越过了新诗的流派分析和社团解剖,也从诗歌的语音、语象、语义的“本文结构”分析中幡然走出,坚持着眼于一定历史境遇下新诗本文与诗人及其时代的整体关联,考察新诗的诗性思维、新诗所需要的有效经验以及与之相称的表达,这便是努力从“话语”层面,追问新诗是什么以及“新诗何以成为可能”,也即新诗之为新诗的内在依据是什么等一系列本体论问题。这样的学术努力比前述任何一类新诗研究都更鲜明地通向有关新诗的实存、质量与特性的解说,因而我称它为一种学术开拓。

当然,张桃洲的这本书仍旧还是一部新诗史论性著作,而不是一般的诗学理论,因此它不能也不必直不愣登地就什么是诗的问题做出自

己勉为其难的回答,虽然作者有充分的意识去思考这样的诗学本体问题,——在与桃洲进行学术交流与探讨的那些年中,我注意到他对这一问题的浓厚兴趣和学术追问的热忱,也曾对他得出的诗性就在于思维语言张力的“内敛”这样的说法有较多的保留。不过作者显然清楚,研究新诗的要害问题并不是新诗应该“怎样”,而恰恰是新诗为什么会是“这样”。从传统的政治学以及时代精神汇合论等角度探讨这样一个新诗本体问题固然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即使从喧闹一时的“现代性”的角度也同样得不到比较切近的解说,因为诸如此类的回答与解说固然可能会正确而可靠,但结果往往正因其正确而变得并不可靠:当政治的、社会的、时代的或现代性的回答是正确的,那么它必然放之四体(小说、散文、戏剧、诗歌)而皆准,径用于新诗,能可靠吗?于是张桃洲挑拣起“话语”的概念,认为新诗本质上就是一种“话语”,一种诗性的“话语”,它是以特别的语词样式(诗歌本文结构)呈现出来的言说,其内部渗透着言说者(诗人)的个人精神气质,同时其现实内容与意义又彰显了言说者(诗人)与现实世界的关联。诗人与世界事实上是通过诗歌本文进行着对话,万般意蕴都交汇在对话关系中。这里的“话语”既包含了语言的表达也包含了表达以前的诗性思维,所有这些才是关乎诗歌本体的东西,与诗歌的实存、质量和特质密切相关。

由于张桃洲的新诗话语研究涉及到新诗是什么以及新诗的诗性思维及其本质属性这样一些本体性的问题,他对于新诗历史发展进路上的各种创作现象、理论现象的剖析就显出了一种高屋建瓴的学术张力和游刃有余的学术气派。他发现并很好地阐述了新诗发展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与 90 年代的“对应性”问题,新诗发展过程中的人称转换和“我”与“我们”的人称纠合现象,新诗特定阶段的大众语与群众性诗歌的某种颠覆性意义,以及 90 年代诗歌创新的频度与力度等等,其中凸现出来的多是作者勉力发现和深入思考的学术印迹。其中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对新诗格律“内在化”的论述,以及关于“四五”诗歌诗学史意义的分析。

新诗“话语”的言说必然涉及诗歌的基本外在特征——诗歌的声律与音乐性。桃洲显然比较倾向于认同新诗的格律只能趋于“内在化”的

见解,并把“内在化”与诗人郑敏的“诗的转换”说直接联系起来,认为这是诗人根据现代汉语自身的特点,对现代汉语(特别是各种日常语言)所具有的散文性、浮泛化进行剔除和锤炼的表现,它使得诗人往往根据“内在”情绪的律动而选择一种既贴合这种情绪本身的节奏、又符合现代汉语特性的形式。这样的见解确实注意到了诗歌思维的内在音律现象,也就是说注意到了“诗的魂魄”,但是我觉得也对新诗的外在的音响节律做了较为科学的析理与规定。这是从诗歌的内在思维和内听觉效应出发对诗歌的外在音律和节奏做出的析理与规定。这方面的研究任务在这本书里显然难以完成得深入透辟,但这一问题的提出确实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我以为,这是从新诗话语研究的角度所能提出的最深刻也最富有实际操作意义的问题之一。

新诗话语的理论实验必须在学理上引入古典诗歌的话语范畴及其魅力作为参照系,在这一意义上张桃洲拾取了已经流落红尘若许年的“四五”诗歌,他别出心裁地看到了“四五”诗歌运动的古典取向及其对新诗自我更新的促动,并且说这让人联想起晚清的“诗界革命”对于“五四”新诗运动的奠基性功用。“四五”可以视作自新诗诞生之日起就与之相伴的旧诗“阴影”对新诗的集中覆盖,或者说是新诗与旧诗持续争夺“生存权利”的“总演习”。这样的学术判断显然是从诗歌话语的层面得出的,正因如此,放之于新诗发展的历史层面就显出其特别具有穿透性的力度。

由上述两个方面综合起来,我倒觉得诗歌的话语研究不仅对新诗的历史现象和创作思维的解析大有帮助,即使对旧诗的革新这一长期困扰文学界的问题的解决也不无启迪。如果说诗歌的格律应该从“内在化”的情绪律动和诗性思维,以及内听觉效应等“话语”因素加以建构,则旧体诗歌的格律也应考虑摆脱古老的词牌曲调的窠臼,从这些话语因素方面重新建构或者修正自身的格律方案。旧体诗之美决定了它离不开格律的制约,带着镣铐跳舞是它特别生动的状态,因此,主张旧体诗歌可以不按格律是对旧体诗歌审美特质的漠视。但旧体诗歌的格律之美如果考虑“内在化”的诗性思维和内听觉效应,则就不必在有些硬性要求尤其是平仄声的运用上墨守成规,因为现代的读者很少有人

再能够或者愿意按古音去朗读或默念旧体诗歌,那么,今天的韵脚、平仄仍按古韵规矩,岂不是背离了诗歌格律设置的原则和意义?要知道古今音调声腔的变化如此之大,按古韵书谱填字押韵的结果在今天的绝大多数人读起来反而不押韵,反而使得抑扬顿挫变为佶屈聱牙。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否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样的现象确实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存在。我之这样说并非斗胆要在旧体诗歌的改革上有所置喙,而是试图说明,张桃洲从话语角度研究诗歌的学术开拓,其所能够提出并解决问题的涉及面会如何之广。

从攻读博士研究生时开始,张桃洲就一直坚持从话语的角度研究新诗,坚持默默地进行着这样的学术开拓。许多前辈学者都看到了这种学术开拓的可贵,于是给这个年轻学者以颇多的关注与抬爱。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在内的各家高规格的学术刊物都曾乐意采用他的文稿,这对他的学术开拓是一种不小的鼓励;通过严格的学术评审,他获得了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唐弢学术奖;在他极其困难的时候,吴思敬教授、王光明教授接受他作为博士后研究人员进入首都师范大学;洪子诚教授在审读他的稿件的时候慨然决定将他的书稿列入北京大学高规格的诗学文库;其他如孙玉石先生、赵园先生、刘纳先生等,还有他自己的师辈如王泽龙、李怡、程光炜、王本朝、周晓风、江锡铨等教授,都或曾表示过对他学问的赞赏,或曾表示过对他前程的关注。至于他的同辈诗人和诗评家,那就更不用说了。刚刚出道就得到这么多人的关爱,张桃洲应该知足,虽然他曾遭遇过不公正的命运的拨弄,但在众多先生的热忱帮助下这一切迅速过去之后,命运拨弄的记忆岂不又成了普希金所说的“亲切的怀念”?

无论如何,就像面前的这本书所谕示的那样,张桃洲的学术之途和人生历程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他已经走进了充满正气的北京学坛,相信他通过学术开拓走出来的学术道路将能引领他从此进入人生的顺境。但越是在这个时候,忝为导师的我总还是想对他多说一些。想说的话在以下的空白处写了几次,又都被我迅速删除。面对着此时的桃洲以及背井离乡的我本人,我也陷入了经验与表达的困境之中。

幸好我在南大的学生们的电脑中依然保存着我一年前在台湾写的

一封信。那是桃洲临离开南京大学的时候,我布置为他举办一次学术沙龙,算是送行。我特地写了这封信,既给桃洲也给我的其他研究生,通过电邮发给他们,让他们在沙龙结束时读出。尽管是彼一时之“话语”,表述的意思中却有我如今想表达而表达不好的部分。于是照录如下:

各位晚上好:

借这个机会,我通过 E-mail 对朋友们,对我的学生们,对即将离开南京大学的桃洲说几句。

虽然我所在的台湾佛光大学风景非常优美,它坐山面海,水碧天青,树涌云起,清新一派,蜿蜒的山道伴随着喧哗的山涧,拨开山石的嶙峋和丛林的榛莽,清冽宜人的空气始终带着空山新雨之后的凉爽,但我还是每天怀想着南京大学,盼望知道那座拥挤的校园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无论是欢欣还是失落,无论是辉煌的规划还是宵小的伎俩。南大乃至中文系,属于我们每一个南大人,属于每一个曾在以及还在南大学习、工作并且深爱着它的人士,也自然属于一个在南京大学完成最高学历教育的那位叫张桃洲的博士。虽然桃洲从此离开南大,离开南大中文系,离开南大的现代文学专业,但你的学术之根在这里,你正是从这里发出了你学术生命中最初的啼哭和最初的狂欢,这一切都足以让你永远刻骨铭心。

南京大学的现代文学专业,是陈瘦竹这位杰出的大师奠定的基业,是包括邹恬先生在内的许多先辈毕生心血浇灌出来的茁壮和辉煌。它是严谨的学风、开拓的精神和坦诚的情感的结晶。它的曾有的正派、庄严和令人感动的气氛可惜各位很少能够体会。现在这一切都似乎边缘化了。但这毕竟是根基,是传统,是铁的历史。我说这些就是要告诉桃洲,告诉在座的我的所有的学生,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前路的穷达,你们都属于这个有着很深的根基、很好的传统、很真的历史的现代文学专业。在这样的根基、传统和历史面前,个人的得失、无谓的恩怨算得了什么?于是,应该关心这里的每一声欢呼 and 每一声叹息,并尽量能同心同德,欢呼着这里的欢呼,叹息着这里的叹息。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中国的学术中心。在这样的中心里,我想桃洲会感到比在别的中心更加舒畅。不过,京城米贵,居之不易。在别的中心,你的成就,比方说 30 出头就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崭露头角,这足以让别人汗颜;可在北京那个学术中心,这简直算不了什么。你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不过以你的诚实和勤奋,以你的敏感和聪慧,以你的基础和积累,再

加上那边师友的帮衬和扶持,我想你一定会有更大的作为,更大的发展。我期待着这一切,我更期待着到你到每一个境界,都依然爱南大,爱南大中文系,爱南大现代文学专业的根基、传统与历史。

本来,桃洲离开南大,我应该送一下,至少吃顿饭。但桃洲知道,我不喜欢师生之间交往过于世俗化。于是没能送行也就算不了什么遗憾。不过不说几句也觉得太冷漠。所以我安排了这一次学术沙龙。为了冲淡这样的冷漠,我尽量将上面的话说得热情一些。我希望这些话在学术讲演结束之前念一下,这个时候,我保证,我正在海峡对岸,在一座充满虫喃蛙鸣的山上眺望着大海。

谢谢大家!

现在我也离开了南大,离开了南大中文系,但我依然还是想这样说,因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专业,本来真是有着很深的根基、很好的传统、很真的历史的。

2004年12月6日记于暨南大学

目 录

序.....	(1)
导论 中国新诗话语研究.....	(1)

上篇 理论探讨

第一章 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	
——20 世纪中国新诗语言问题	(17)
第二章 从外部音响到内在节奏	
——新诗格律问题的再思	(36)
第三章 中国新诗的对应性特征	
——以 40 年代和 90 年代为例	(46)
第四章 “新民歌运动”的现代来源	
——一个关乎新诗命运的症结性难题	(59)
第五章 主体意识:介于个体与群体之间	
——中国新诗的两种人称辨析	(69)
第六章 历史转换的悖谬与契合	
——“四五”诗歌运动的诗学意义	(80)
第七章 语言与精神的两难	
——透过鲁迅考察中国新诗的境遇	(88)
第八章 别样的新诗本质观	
——重解废名对新诗的解说	(100)
第九章 现代解诗学与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史论建构	
——从孙玉石的新诗研究看现代主义的理论维度	(112)

下篇 现象评析

第十章	有待开掘的矿藏	
	——“九叶诗派”的历史形象	(129)
第十一章	存在之思:非永恒性及其魅力	
	——发掘冯至《十四行集》的内蕴	(144)
第十二章	徘徊在诗与思的幽径	
	——郑敏诗思与诗学言路的共通性	(173)
第十三章	“独自成俑”的诗与人	
	——梁小斌与朦胧诗的历史命运	(194)
第十四章	现代诗歌的位置	
	——王家新与 90 年代诗歌型变	(210)
第十五章	穿梭于地面的技艺	
	——臧棣与 90 年代诗学核心	(221)
第十六章	寻找话语的森林	
	——朱朱: 90 年代诗歌的词与物	(234)
第十七章	“在歌曲中居住……”	
	——西渡与 90 年代诗歌的声音问题	(264)
后记		(281)

导论 中国新诗话语研究

一 新诗“合法性”危机与新诗研究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新诗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而浮泛起来的商业主义和大众文化,极大地冲击着新诗而使之趋于“边缘化”,诗歌比其他文类更迅速地退出公众的视线;另一方面,诗歌阵营开始急剧分化,80 年代风起云涌的诗歌流派纷纷消散,大部分诗人通过“自我放逐”而进入一种“私人化”写作状态。人们不禁惊呼:新诗衰落了!

在这种情形下,新诗研究一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亟待进行全面的反思。可以看到,长期以来新诗研究者往往出于对诗歌社会功能的强调,或者依据简单的“内容—形式”二分法或狭隘的“传统—现代”的对立思维,要么将新诗的历史描述为一种诗潮(或“主义”)排挤另一种、一个流派取代另一个乃至一类阶级压迫另一类的“更替”史,要么将新诗演绎成在传统和西方的阴影下难以独立的“附属品”。研究者乐于给新诗归类、划派和定性,而没能在诗的意义,对新诗的各种现象和嬗递过程及诗人作品本身做出合理的阐释。当他们说郭沫若是浪漫主义、艾青是现实主义、戴望舒是现代主义,当他们把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同列为浪漫主义或一并把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划入象征派,评论者事实上是将种种“主义”、流派生硬地割裂开来,忽略了它们之间和各自变迁的复杂性,以及诗人自身及其作品内涵的丰富性。虽然“主义”论述有助于对新诗进行“史”的把握,但由于评论者总是逡巡于新诗外部而并未趋近新诗“本体”,结果把新诗之为新诗的根本性追问,在一阵匆忙含混的描述和结论中遗忘了。

不过,提到新诗“本体”,实际上并没有一种本质化了的抽象的新诗

“本体”，毋宁说新诗研究要在一种“回归本体”的吁求下，逐步抚去掩盖（笼罩）在新诗之上的历史烟尘，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新诗自我生成和敞开的过程上，从而更为内在地把捉到某种程度的历史“真实”。我注意到，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近年来，作为一个口号和目标，“走向新诗本体”已经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并取得了较大的研究成果^[1]。这主要表现在，研究者摒除某些观念“禁区”的束缚，逐步拓宽了自己的研究视野，通过深入发掘，澄清了某些诗学和史实的疑点；同时他们注重引进和吸收西方先进理论，更新或调整自己的观念和方法，获得了一些相当有见地的理论发现；在理清新诗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有些研究者建构了可资借鉴的史论体系。尽管如此，现有的新诗研究还存在着诸多不足。笔者以为，新诗研究的突出成就及其不足可以从如下几个论域显示出来。

首先，对某些新诗史现象的重新发掘和确定。80年代初期，新诗研究还处于对历史沉积进行清理的阶段，此际最为突出的成果是关于新诗社团或流派的重新认定和发现。不过，当研究者拘泥于某一社团或流派，试图整一地寻求它的整体特征时，事实上也在某种意义上简化了历史，从另一个侧面掩盖了新诗史和一些诗人个体不为人察觉的复杂性。8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新诗研究一个明显的趋向，即是把过去的在狭隘现实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研究视阈，扩展到一些所谓非现实主义的领地，比如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研究。将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作为一个论题凸显出来，这本身暗含了某种“反拨”，即释放那些被主流观念压抑的诗歌现象。但必须指出的是，对新诗的现代主义进行研究，从根本上说同其他“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研究一样，仍然是在一定的外在的框架里展开的，仍然由于其概括性而显出整一化倾向。况且，种种“主义”之谓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限度，它们事实上都有待于进行一次立足于本土语境的“正名”^[2]，它们自身的含混性势必导致新诗面目的模糊不清。

其次，新诗研究观念的转换。在很多研究者那里，新诗开始被视为寻求“现代性”的产物或“现代性”反应的结晶，“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这一宏大的现象本身已自足地构成一种新的诗歌传统的历史”^[3]。

“现代性”作为一个观察新诗的视角,其重点在于思考新诗同它得以生成的历史性根基的关系,这种关系包含了两个因素,即人们常说的传统和西方,尤其是前者——中国古典诗歌。在“现代性”的烛照下研究者发现,“新诗的诞生不是反叛传统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不断拓展的一个新的审美空间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旧诗对新诗的影响,以及新诗借镜于旧诗,其间所体现出的文学关联不是一种继承关系,而是一种重新解释的关系”^[4]。新诗之与西方的关系同样如此。对上述两类(新诗与古典、西方)关系的思考是新诗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它构成了20年来新诗研究的另一重大成果。

其三,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逐步提出了一些接近新诗“本体”的、有价值的概念和方法。譬如,康林在他的系列论文里提出了“本文结构”的概念,他把新诗的“本文结构”划分为语言体式(含语音组合和文法关系)、语象世界和语义体系三个层次。运用这一方法,他剖析了《尝试集》的“本文结构”,以惊人的清晰和细腻理出了《尝试集》的作者,是怎样一步步促使古典诗歌本文结构的瓦解直至建构新诗本文结构的全部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汉语抒情诗的本文结构”“从古典形态过渡到现代形态”的过程^[5]。只是,由于康林的研究侧重于个案分析,他的“本文结构”方法并未得到普遍重视,因而也就没有得到大面积的推广。作为一种方法论,“本文结构”(textual structure)分析也许是新诗研究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它类似于一种形式分析,或者说具有一种极强的“形式”感,将一向为人所忽略的“形式”置于研究的中心,切实地触摸到诗歌的质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趋近了新诗“本体”。不过,“本文结构”分析由于过分看重新诗本文的“语音”、“语象”、“语义”等等之间的相互牵连,由此给人以用“标准化”语言模式去规范或切割新诗本文的印象,且没有更加宏阔地去留意它们自身的历史相关性,即在一定历史境遇下新诗本文与诗人及其时代的整体关联,因而在论述时达不到史的纵深感和诗与史的整合效果。这不能不是一种缺憾。

综观现有的新诗研究我们发现,虽然迄今已有多种“现代”或“当代”新诗史,但似乎尚未出现这样一种关于新诗的“现代诗学”:一方面,它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的“真实”,从诗歌“本体”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

新诗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在对新诗历史进行整体探究的基础上,对新诗的许多症结性诗学难题做出透彻的阐释。新诗研究不仅要进行新诗“身份”的确认,而且要找寻新诗之生存“合法性”依据。这可以归结为同一个问题:新诗何以成为可能?即新诗之为新诗的内在依据是什么?如果说上述的种种研究成果,主要是从不同方面解决了新诗之“怎样”的问题,那么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或许可以套用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的话来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对于新诗来说,要紧的不是它是“怎样”的,而恰恰是它是“这样”的——新诗之“这样”的问题却始终处于被悬搁的状态。而这,恰恰应该成为新诗研究趋近于新诗本身的关键所在。对于新诗之“这样”的探询,意在给出如下设问:中国新诗在 20 世纪为何“这样”而不“那样”?这个“这样”里面是否以及有着什么样的内在机制和堪与这一世纪相称的“现代性”质素?

二 新诗“话语”研究的理论有效性

基于对以上设问的思考和回答,笔者尝试着提出一条可能的思路:从“话语”的角度进入新诗研究,以期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崭新的现代汉语诗学。必须承认,运用“话语”这一术语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因为“话语”事实上是一个已被“用罄了”(used)的语词,它就像海德格尔(M. Heidegger)的“存在”一样,既晦涩又无处不在。人们时常浑然不觉地把它挂在嘴边(这在当前各类评论中十分常见),似乎对它的含义和用法了然于心,但一旦真正用心去探究它,则发觉要么对它一无所知,要么将它摆弄得含糊不清。当 20 世纪(特别是 60 年代以后)西方语言学、哲学、修辞学和文学理论频频启用“话语”后,它们分别赋予这一术语特定的内涵,这一方面凸现了“话语”在生活和学术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由于各自界说的分歧导致了“话语”使用上的更多混乱(以致不能在同一层面谈论“话语”)。因此,这里首先要阐明新诗“话语”研究的理论有效性和必要性。

按照通常的理解,“话语”(discourse)就是指日常生活中的讲话或言谈,它涵盖从人们发表的长篇演说到作为应答的只言片语,甚至包括随